

石油危機與蘇聯解體之關係

● 曾鏡濤

一 前言

蘇聯解體是二十世紀歷史中最震撼人心的大事，然而這空前鉅變到底是怎麼樣發生的，卻至今令人大惑不解。蘇聯是近世最強大帝國之一，它橫跨歐亞兩大洲，幅員之遼闊無與倫比；它的五百萬紅軍裝備精良，虎視眈眈中國和西歐；它的核武、潛艇與飛彈嚴陣待命，隨時足以毀滅地球數次有餘；至於它組織力量之緊密強大，無遠弗屆，更是眾所周知。所以它的領導人誇下海口，一定要埋葬資本主義世界，那絕非戲言。可是從1985至1991短短六年間，在完全沒有外敵入侵，沒有任何大規模流血革命，更沒有軍人干政倒戈的情況下，執政的蘇聯共產黨卻乖乖的拱手把國家機器讓出，任憑社會興起的敵對力量宰割分拆，以至偌大帝國一朝之間土崩瓦解，煙消雲散。其驚心動魄，波譎雲詭，恐怕只有五百年前西班牙的科爾特斯 (Hernando Cortés) 將數百勇士於數月間征服、奴役數千

萬眾的阿茲特克 (Aztec) 帝國差可比擬吧。

事實上，當時局勢發展是如此出人意表，1989年以後政治演變節奏更是瘋狂加速，不但旁觀者為之張口結舌，即使是當事人亦同樣神昏目眩，無所適從，待得山河變色，大局底定之際，他們痛定思痛，回溯前塵，已經頗有「事如春夢了無痕」之概了。甚至直到今天，歷史學家還仍然絮絮不休地爭論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有些論者認為末代蘇共領袖戈爾巴喬夫 (Mikhail Gorbachev) 急於推行政治改革是嚴重錯誤，因為這動搖了共產黨統治的根基，最後導致政權崩潰。然而，我們不能不注意，戈爾巴喬夫最初推行的其實只是經濟改革，在經濟改革失敗後，才不得不轉而以政治改革來挽救經濟改革。這一點曾經有不少學者指出，例如拉特蘭 (Peter Rutland) 在本刊第85期的〈解體與恢復——從戈爾巴喬夫到普京〉^①一文中就論述得很清楚，只不過他對蘇聯解體的過程着墨不多而已。

蘇聯解體是二十世紀最震撼人心的大事，今天歷史學家還在爭論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有些論者認為末代蘇共領袖戈爾巴喬夫急於推行政治改革，動搖了共產黨統治的根基，最後導致政權崩潰。然而，我們不能不注意，戈爾巴喬夫最初推行的其實只是經濟改革，在經濟改革失敗後，才不得不轉而以政治改革來挽救經濟改革。

*作者蒙陳方正老師的熱心鼓勵與提供寶貴意見，獲益良多，特此表示衷心感謝。

美國作家施魏策爾指出，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是里根政府對蘇聯所發動的經濟戰爭，而主持經濟戰的關鍵人物則是當年的中情局局長凱西。1981年1月里根宣誓就任美國總統，其後兩天便馬上在白宮內召見凱西。兩人是多年好友，凱西更是里根競選總統的經理人。圖為1980年凱西擔任里根競選總部主席時兩人合照。



對此問題有更深入與具體研究的是美國作家施魏策爾 (Peter Schweizer)，他在訪問了多名里根 (Ronald Reagan) 政府的要員後，於1994年寫成《勝利：里根政府加速蘇聯解體的秘密戰略》(Victory: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s Secret Strategy that Hastene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一書^②，指出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是里根政府對蘇聯所發動的經濟戰爭，而主持經濟戰的關鍵人物則是當年的中央情報局局長凱西 (William Casey)。此外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科特金 (Stephen Kotkin) 在2001年發表的《倖免的大戰：蘇聯解體，1970-2000》(Armageddon Averted: The Soviet Collapse, 1970-2000) 則指出^③，蘇聯經濟結構早在1970年代初已經出現嚴重問題，只不過由於1973年的石油危機引起石油價格大幅度上升而得以紓緩，然而1985年後石油價暴跌則使之受到致命打擊，以致經濟危機一發不可收拾，終於導致帝國瓦解。顯然，這兩種觀點是相輔相成的，它們解剖了國際政治戰略在最高層次的運用。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當可以對蘇聯解體這場翻天覆地的鉅變得到更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二 舉足輕重的情報局長

1981年1月里根宣誓就任美國總統，其後兩天便馬上在白宮內召見中央情報局局長凱西。這是極不尋常的舉措，因為一般來說，剛上任的總統有很多重要得多的事務必須處理，例如討論該年度財政預算，決定各部門的人事安排等等。但是里根與凱西的關係非比尋常：他們既是多年好友，又具有同樣的政治意識形態，凱西更是里根競選總統的經理人。當凱西在1980年1月接手為里根競選總部的主席時，形勢並不樂觀，總部內一片混亂。里根另一位好友及首任國家安全顧問艾倫 (Richard Allen) 回憶當年的競選情況，頗歸功於凱西扭轉乾坤的大力。據某些傳媒的傳說，凱西當年在競選形勢進入白熱化之際曾與伊朗宗教領袖霍梅尼 (Ruhollah Khomeini) 的代表在歐洲接觸，達成秘密協定：伊朗把拘押的美國人質的釋放時間延至大選結束之後，以暗助里根一臂之力，而里根則答允在當選後向伊朗供應武器，作為回報。這項傳說雖然未能證實，但由此可以看出在一般人心目中，凱西所擔當的重要角色。

里根也深知他的總統寶座得之不易，全賴凱西的高度政治嗅覺與管理能力，所以對他言聽計從。但是里根當選後的人事安排，卻令使凱西大失所望：他在新內閣中並未能佔重要席位，他屬意的國務卿一職落到尼克松 (Richard M. Nixon) 年代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總司令黑格 (Alexander Haig) 將軍手中，但他對里根的競選毫無貢獻，不論在政治意識形態或者派系關係上，也都算不上里根的同路人。所以當里根決定委任凱西為中央情報局長時，他頗為遲疑不決，幾經考慮才在數天後提出接納委任的三項條件：第一，是把中央情報局長一職升格至內閣閣員的地位，也就是要參與外交政策的制訂，進入高層決策圈子；第二，局長要在白宮內有辦公室，以便於與總統及其幕僚隨時接觸，增加對政策的影響力；第三，要隨時可以和總統單獨接觸，不須通過第三者安排。

里根對此三項條件毫不猶疑地接受，凱西從而成為美國史上最具權力的中央情報局長：他不獨參與國家安全議會，而且在即將成立的制訂外交政策核心組織「國家安全計劃小組」中也有席位。事實上，凱西對里根的影響力遠遠超出了這些官職名份以外。他倆同是愛爾蘭裔的美國人，年齡相若，經歷過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培養出同樣的世界觀。在里根任內，兩人每星期至少會面兩次，而且通常是單獨討論，至於電話上的交談，更不計其數。在里根上任之初，亦即外交政策定位的關鍵時刻，凱西、艾倫和國防部長溫伯格 (Caspar Weinberger) 等三人成為里根內閣中反共反蘇強硬派的核心。

凱西生於1913年3月13日，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受雇於經濟戰爭署

(Board of Economic Warfare)，據自稱他的工作是設法找出希特拉的經濟弱點，然後以各種經濟戰的手段削弱和破壞納粹德國的戰時經濟。此後他加入中央情報局的前身，戰略服務辦公室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OSS)，由於表現出眾，不久被委任為歐洲戰區的情報主任，成績卓越。戰後凱西又曾在金融界服務，並當過美國證監會主席。二戰經驗對凱西日後影響很大，使他深切感覺到這些另類作戰方式可以用在與蘇聯的鬥爭上。他在二次大戰回憶錄中寫道④：

我認為特務情報工作，秘密行動和組織地下反抗力量，在與希特拉的戰爭中起了很大作用，挽救了很多寶貴的生命和資源。認識到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因為在應付未來的危機中，這些工作比人造衛星和飛彈都更為重要。

由於這一段不平凡的經歷，促使里根決定委任他為中央情報局長。這時的凱西已屆六十七歲高齡，戴着金絲眼鏡，頭上白髮半禿，儼然一位慈祥長者的外貌，一點也不像是里根的特務頭子。

三 經濟戰略的制訂

凱西上任後，首先向里根要求放鬆對中央情報局秘密行動的控制。自1960年以來中情局的秘密行動均由各有關政府部門派官員組成委員會監督，這包括國防部、國務院和聯席參謀部的高層官僚，人多耳眾，不易保密。凱西建議改由國家安全計劃小組負責直接監督，由於該小組僅由總統、副總統、國防部長、國務卿、國

凱西在里根決定委任他為中情局局長時提出三項條件：第一，是把中情局局長一職升格至內閣閣員的地位，也就是要參與外交政策的制訂；第二，局長要在白宮內有辦公室，以便於與總統及其幕僚隨時接觸；第三，要隨時可以和總統單獨接觸，不須通過第三者安排。里根對此三項條件毫不猶疑地接受，凱西從而成為美國史上最具權力的中情局局長。

里根政府上台不久，便先後定下一系列向蘇聯主動出擊的政策，當中經濟戰的手段包括：爭取沙特阿拉伯壓低石油價格，以減少蘇聯外貿盈餘；游說西方盟國禁止對蘇聯輸出高科技，以抑制蘇聯工業發展；散布假偽的工業技術情報，企圖混亂和阻撓蘇聯工業計劃；收縮西方對蘇聯的信用貸款，使蘇聯及其東歐附庸國不能輕易以信貸解決現金短缺的問題。

家安全顧問和中央情報局長等人組成，是政府內制訂外交政策核心中的核心，如此一來便能夠使秘密行動真正名實相符。里根接納了此項建議，並規定國家安全計劃小組討論的秘密行動不事先列在議程上，小組成員在會議上即席發表意見，從而完全排斥了各成員屬下幕僚的參與。在里根的八年任內，中央情報局的活動大部分便是在這樣的黑箱作業形式下進行，鮮為外界所知聞。

接着，在了解中央情報局的實況後，凱西馬上進行整治：他着手加強對蘇聯經濟的情報和研究工作，聘請蘭德公司 (Rand Corporation) 前任總裁羅恩 (Harry Rowan) 擔任主理國家情報議會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僱用《財富》雜誌 (Fortune) 前編輯邁耶 (Herbert Meyer) 為他的特別助理。這兩人都是研究蘇聯經濟的專家。凱西委任的白宮聯絡人威格 (David Wigg) 也是經濟學者，而且是中央情報局內監察及追溯蘇聯外匯收支機制系統的設計人。從凱西任用和倚重的幹部來看，便可以知道他的心思重點所在。威格回憶當年說：「凱西在中央情報局的頭一年花上很多時間去了解蘇聯經濟的實際運作，至1982年春天他開始掌握到它的脈搏。」有一天，凱西對威格說：「他們倚靠與西方貿易和西方的技術生存，而唯一積累外匯的方法是以高價輸出石油。這真是不可思議，要是我們能好好的利用手上的牌，他們便會潰敗。」

在第一次國家安全計劃小組會議中，凱西在艾倫和溫伯格的支持下，提出修正美國向來對蘇聯的政策，從消極的圍堵，改為爭取主動。他認為：追求維持美國相對性的軍事和經濟優勢是不夠的，其效果只是拖延時日，美國應積極尋求和採用削弱蘇聯

國力的政策。艾倫也從旁補充說：民主政體在與獨裁政體的鬥爭中，先天上已吃了虧，所以在戰略上應盡量發揮本身的長處，尤其是在經濟上的優越性。凱西引用中央情報局的原始資料，指出蘇聯的計劃經濟是他們的致命弱點，蘇聯工業自1970年以來便停滯不前，多種產品供應不足，情況比一般人想像中更嚴重。此外蘇聯在東歐的負擔、波蘭的煩惱、阿富汗戰爭，也都對帝國經濟造成雪上加霜的損害。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機會，處理得當的話，美國可以藉此重創蘇聯。里根對凱西的分析深表同意。

此後凱西指示邁耶進行高度機密的研究工作，評估蘇聯的經濟弱點，提出可供利用的方案。這項任務在中央情報局內是一項創舉，因為它的蘇聯研究一向着重蘇聯的優勢，如軍力、黃金儲備、外援等等。凱西認為情報和分析要為政策服務，而眼前美國的政策是要了解和利用蘇聯的弱點，打擊它的痛處。1982年5月里根總統簽署了一份國家安全決策備忘錄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memorandum, NSDM) 作為對蘇聯政策的主導思想，這份長達八頁的文件明確地說：要蘇聯為他們的經濟弱點付出代價。在凱西、艾倫和溫伯格等人的策劃下，里根政府上台不久，便先後定下一系列向蘇聯主動出擊的政策，以貫徹落實這一思想，其中包括：

- (1) 秘密支持波蘭的團結工會，使它在蘇聯的心腹地區成為一股反對力量；
- (2) 秘密支持阿富汗的伊斯蘭武裝反抗力量，並把戰爭擴大至蘇聯境內；
- (3) 爭取沙特阿拉伯壓低石油價格，破壞蘇聯天然氣輸出西歐計劃，以減少蘇聯外貿盈餘；

- (4) 游說西方盟國禁止對蘇聯輸出高科技，以抑制蘇聯工業發展；
- (5) 散布假偽的工業技術情報，企圖混亂和阻撓蘇聯工業計劃；
- (6) 積極發展高科技軍備，即所謂星戰計劃，誘使蘇聯投入大量資源進行軍備競賽，從而加劇蘇聯的經濟危機；
- (7) 收縮西方對蘇聯的信用貸款，使蘇聯及其東歐附庸國不能輕易以信貸解決現金短缺的問題。

這些政策除了第1、2、6三項表面看似是外交和軍事上的對抗外，其餘都是直接的經濟戰手段。歸根究柢，這七項政策都是為了打擊蘇聯經濟，削弱其國力，動搖其士氣民心。當然，里根政府在推行這些政策的時候，也還只是希望造成對蘇聯的重創，卻萬萬料不到政策的綜合效果如此之猛烈，以致在里根下台之後，蘇聯終於走上解體之路。

四 石油：蘇聯經濟的命脈

據中央情報局在1985年的估計，蘇聯因阿富汗戰爭每年耗費三十至四十億美元，為了支持波蘭的共產黨政權對付團結工會支出十至二十億美元。由西伯利亞至西歐的輸氣管因美國的反對和技術禁運而延期損失，使蘇聯外匯收入減少一百五十至二百億美元。西方科技禁運和假技術情報對蘇聯工業的負面影響，大概每年在數十億美元左右。至於蘇聯因為回應美國的星戰計劃而投入軍備競賽的負擔，很難有一個估計，但星戰計劃是一個長期的方案，在1980年代蘇聯不可能也沒能力為此投下大量資金。

與這些耗費或損失相比，蘇聯由輸出石油而得的收入對蘇聯的外匯結

存有決定性影響。自1970年代開始，國際石油價格不斷上漲，加上西伯利亞新油田投入生產，蘇聯的石油出口量增加了22%，二者的共同效應使它的石油收入大幅度上升270%。自1973至1985年，以石油為主的能源輸出為蘇聯賺取大量外匯，佔了對外貿易的80%。據1980年代中期中央情報局的估計，石油價格每增減一美元，蘇聯歲收入便相應增減十億美元，因此石油價格成為蘇聯經濟建康的關鍵因素。而且，油價不單直接影響蘇聯外匯收入，它對蘇聯軍火貿易收入也有間接影響，因為很多石油輸出國家，也恰好是蘇聯軍火的大顧客，這些新興石油富國，往往在油價上升時大手筆購買蘇聯軍火，在油價下滑時則延期付款甚至於取消訂單。

不少西方政論家及歷史學者認為：1970年代蘇聯從石油賺取的意外財富只是把它的基本經濟問題暫時掩蓋，使領導人可以依樣畫葫蘆照走老路，不必在制度改革上傷腦筋，開放經濟。事實上，蘇聯工業到了1970年代已經疲態畢露，1950年代的高速增長，早已成為歷史。從表1的統計數據可以很清楚的看出蘇聯工業生產增長率自50年代後每況愈下的趨勢。即使是按蘇聯的官方數據，到了1970年代末，其工業生產只不過達到每年低個位數字的增長。但在計劃經濟體系中，產品沒有經過市場考驗，質量往往不合標準，乏人問津，這樣低的年增長率，是徒然自欺欺人而已。除此之外，蘇聯經濟還有許多其他方面的問題。首先，沒有國家的經濟會像蘇聯那樣偏重重工業，工業佔國民生產總值的70%。至於其農業則因為集體農場的失敗而年年歉收，使莫斯科每年必須花大量外匯向西方購買農產品。再者，數十年來對環境保護的忽

自1973至1985年，以石油為主的能源輸出為蘇聯賺取大量外匯，佔了對外貿易的80%。據1980年代中期中央情報局的估計，石油價格每增減一美元，蘇聯歲收入便相應增減十億美元，因此石油價格成為蘇聯經濟建康的關鍵因素。而且，油價對蘇聯軍火貿易收入也有間接影響，因為很多石油輸出國家，也恰好是蘇聯軍火的大顧客，它們往往在油價上升大手筆購買蘇聯軍火，在油價下滑時則延期付款甚至於取消訂單。

表1

	平均工業生產年增長率		工業勞動生產力增長率
	蘇聯官方數據	中央情報局估計	
1951-55	13.1	10.2	7.4
1956-60	10.4	8.3	7.4
1961-65	8.6	6.6	4.5
1966-70	8.5	6.3	5.5
1971-75	7.4	5.9	5.9
1776-80	4.5	3.4	2.8

資料來源：歷年聯合國出版的歐洲經濟數據；美國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出版 *USSR: Measure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1950-80*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2)。

石油財富使蘇聯的軍備力量在70年代大為提升，甚至有凌駕美國的氣勢。然而在表面風光的背後，卻早已種下了日後的苦果。蘇聯大部分工業都是建立在30年代，到了70年代，這批過時的工業架構卻因為領導層缺乏危機意識，而沒有更新改進。相反，經歷隨着高油價而來的經濟衰退的西方國家，展開了一場新的工業革命。至80年代中葉漸漸走出谷底，開始另一波的經濟景氣。

視使工業污染日趨嚴重，大大影響國民健康，以致嬰兒死亡率上升，平均壽命下降。這種種社會和經濟問題都在1970年代相繼出現，要是沒有及時得到石油外匯的化解，蘇聯早在當年便要面臨嚴重危機了。

當年這筆石油財富確實使蘇聯的軍備力量在70年代大為提升，甚至有凌駕美國的氣勢；它也足以使蘇共高、中層幹部過着舒適寫意的生活；可以向西方購買足夠穀物飼養牲畜，使菜場上多點肉類供百姓享用；也可以採購西方技術用來改進汽車、紡織、化纖等民生產品；甚至有餘力補助東歐附庸國的能源消費，和應付阿富汗戰爭。這一切都使許多蘇聯人日後情不自禁的懷念當年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的好日子。然而在這些表面風光的背後，卻早已種下了日後的苦果。蘇聯大部分工業都是建立在30年代，要不然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按30年代的規格重建。50年代蘇聯經濟的高速增長，得力於這批工廠和礦場。但是到了70年代，這一批本應淘汰的工業架構，卻因為領導層缺乏危機意識，而因循延誤，沒有更新改進。這些過時的工業架構不單效率低，而且耗能大，污染環境。但

不要緊，因為蘇聯是生產能源的大國，蘇聯領導層當時正陶醉在由石油危機帶來的好時光，幸災樂禍地旁觀着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飽受石油危機的煎熬。

70年代對西方國家來說真像一場惡夢，由中東戰爭誘發的石油禁運使油價在1973年的數月內飆升400%，隨着高油價而來的是經濟衰退和通貨膨脹。在此前西方的經濟體系中，經濟衰退和通貨膨脹從來沒有同時發生過，因此經濟學者要鑄造出「滯脹」(stagflation)一新詞來形容此現象。1973至1975年間美國的國民所得下跌6%，失業率增加至9%；西歐比美國更為倚賴中東石油，因此情況更嚴重，連日本也出現戰後首次的經濟衰退。在這次西方經濟大衰退的陰霾下，一場新的工業革命靜悄悄地展開。由十八世紀末葉發展出來的大型「煙囪工業」(smoke stack industry)，因為耗費大量能源和污染環境，受到時代的淘汰。在英國的設菲爾德(Sheffield)工業區一帶，70年代中因為鋼鐵業不景而失去的職位便有十五萬個，其他的重工業也遭受同樣損失。在德國的魯爾(Ruhr)工業區，超過十萬名鋼鐵工人失業。自美國賓夕

法尼亞至伊利諾州的重工業帶內，工廠紛紛倒閉，大批工人失業，社會上一片愁雲慘霧。在這期間共有超過一千家頗具規模的工廠倒閉，使富有幽默感的美國人把一向引以為傲的重工業區自嘲自諷地改稱為「鐵鏽帶」(rust belt)。

然而舊工業不消失，新工業便無從興起。在陣痛過後，更有效率、更節能省料的新工業誕生，取代了陳舊耗能耗資源的重工業。由於注重效率，西方國家生產力大為提高，傳統工業所需的員工人數大減，部分職位隨着舊工業永遠消失，新職位則環繞新興的知識密集工業應運而生。這種情況，正就是二十世紀上半期與凱恩斯 (John M. Keynes) 齊名的經濟大師熊彼特 (Joseph A. Schumpeter) 所稱的「創造性的毀滅」(creative destruction) 過程，是市場經濟能夠自我調節的表現。西方經濟這一次宏觀調節的過程，始於1973年，一直延續至80年代中葉才漸漸走出谷底，慢慢開始另一波的經濟景氣。

五 80年代的蘇聯經濟

踏入80年代，蘇聯的好運逐漸走到盡頭。1982年11月蘇共中央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去世，象徵着一個時代的結束。從1983年起，西伯利亞的石油產量開始下降，使這個得天獨厚的能源大國出現能源供應緊張的現象。基本原因是蘇聯工業一向不須顧慮成本，習慣性地大量耗費能源，西方學者稱此為「富裕中的危機」(Crisis amid Plenty) ⑤。先後繼承勃列日涅夫的兩位蘇共領導人安德羅波夫 (Yuri Andropov) 和契爾年科 (Konstantin Chernenko) 分

別在1984年2月及1985年3月去世，最後五十四歲的戈爾巴喬夫繼承了這個危機重重的大帝國，負起扭轉乾坤的重任，然而一切都已經太晚了。

蘇聯經濟亮起紅燈，可以從它與東歐國家關係的轉變看出一點端倪。蘇聯對東歐國家的經濟支援是眾人皆知的，但卻很少人知道到了80年代中，東歐國家反過來支援蘇聯。根據哈佛大學蘇聯研究學者施特恩塔爾 (Susanne Sternthal) 收集的資料⑥，在80年代中蘇聯反欠華沙公約國家(羅馬尼亞除外)不少債務，原因是蘇聯要求東歐國家以長期貸款的方式與蘇聯共同開發能源項目，才能保證維持向它們的能源和礦產輸出。1984年蘇聯接受東歐兄弟國的貸款，以補助開發西伯利亞的天然氣和鐵礦，蘇聯則每年以能源和礦產原材料以抵償債務。一名波蘭駐日本大使魯拉日 (Zdzislaw M. Rurarz) 在1985年投奔西方後向《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 揭露⑦：波蘭雖然欠西方二百八十億美元，欠蘇聯五十億美元，但卻不得已要給蘇聯一百億美元信用貸款，作為建輸氣管道進入華沙，和建從煤化氣工廠的投資。蘇聯資金短缺的情況，從這事例可見一斑。

蘇聯資金短缺的主要原因是國際能源價格自80年代初的高峰回落，能源收入向來佔蘇聯總收入60%以上，它的減少使蘇聯從西方賺取的外匯大減。蘇聯一向以低於市場價售賣能源給東歐，為了多從西方賺外匯，蘇聯因此削減輸往東歐國家的能源配額，從1981到84年間，能源輸出東歐從一百八十七億美元減至一百億美元左右。為了繼續購買西方的工業器材和糧食，蘇聯只好向西方借債，借款額從83年的一億美元節節上升，84年九億

能源收入向來佔蘇聯總收入60%以上，能源價格自80年代初回落，使蘇聯從西方賺取的外匯大減。為了繼續購買西方的工業器材和糧食，蘇聯只好向西方借債。戈爾巴喬夫親信顧問沙赫納扎羅說：「我們為了擠出還債的錢，不惜讓人勒緊褲帶，一切可以外銷的東西，如石油棉花汽車等都得輸出國外。但到了1985年，連這些方法都用盡了。」

自從凱西和其他里根政府高層策劃者決定向蘇聯實施經濟戰爭後，美國就不遺餘力地在各方面拉攏沙特阿拉伯，其中最主要的是向它大力提供軍事援助，增加沙特王室的安全感和對美國的依賴。美國向沙特阿拉伯施予的一切恩惠，表面上是不設附帶條件，但據溫伯格後來對採訪他的作家施魏策爾表示：「我們供應沙特阿拉伯武器的原因之一，是要它壓低油價。」

美元，85年十五億美元，86年首四個月又新增六億美元多。東歐國家在這期間也欠下西方不少債務，資料顯示在85年東歐國家欠西方共五百九十億美元，其中一部分可能是經蘇聯貸給東歐的，這部分的債務蘇聯也得擔負起。總的來說，蘇聯所承受按時還債的壓力是蠻大的，引述戈爾巴喬夫親信顧問沙赫納扎羅夫 (Georgi Shakhnazarov) 的話說：「我們為了擠出還債的錢，不惜讓人民勒緊褲帶，一切可以外銷的東西，如石油棉花汽車等都得輸出國外。但到了1985年，連這些方法都用盡了。」

這便是在契爾年科喪禮過後蘇聯經濟的實況。

六 石油武器再度出擊

自從凱西和其他里根政府高層策劃者決定向蘇聯實施經濟戰爭後，凱西等人便不斷向沙特阿拉伯領導人私下游說，要他們增加石油生產，以壓低國際油價。實際上，沙特阿拉伯在當時的處境，有點危機四伏的味道。在它的北方，伊朗和伊拉克正進行一場長期戰爭，戰火隨時可能蔓延至它的國土；霍梅尼領導下的伊斯蘭激進政權，不斷煽動沙特阿拉伯境內的什葉派教徒叛亂，威脅着它的石油生產重地。沙特西方的敘利亞和北非的利比亞，也和伊朗串通一氣，反對沙特阿拉伯的王室政權。最使沙特王室不安的是東北部的阿富汗戰爭，它證實了蘇聯意圖向波斯灣擴張勢力的野心，而且加上蘇聯對南也門和非洲東北角的左派政府的援助，使沙特王室覺得蘇聯要從北東南三面包圍。不管如何看，沙特王室都不免感到四面楚歌，孤立無援。針對這種危機感，美

國不遺餘力地在各方面拉攏沙特阿拉伯，其中最主要的是向它大力提供軍事援助，增加沙特王室的安全感和對美國的依賴。1981年4月美國為了中東安全而建立了中央指揮部 (U. S. Central Command, USCENTCOM)，主要目的是為了保衛沙特王室和油田，為了照顧到沙特王室對美國駐兵該國的敏感性，中央指揮部的總部設在美國本土。里根政府不顧以色列和國內猶太人的反對，向沙特阿拉伯出售高科技的空中預警機 (AWACS) 及其他先進戰鬥機，以增強沙特阿拉伯空軍力量。里根又運用總統特權，不經國會批准就向沙特阿拉伯輸出先進的地對空刺針導彈 (Stringer missile)。1985年初，美國開始為沙特阿拉伯興建一個名為「和平盾」(Peace Shield) 的空防系統，這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外一個應用尖端科技最廣的全面空防系統，此系統以電腦把空中預警機及分布沙特阿拉伯各地的十七個長程雷達站收集的資料與五個地下指揮中心連網，以協調指揮控制和通訊。為了表示保衛沙特的決心，美國又派出四百名技術人員和一千七百名軍事顧問長駐在該國以協助此系統的操作。

美國向沙特阿拉伯施予的一切恩惠，表面上是不設附帶條件，更沒有表示以此換取沙特阿拉伯的增加石油生產。不過在1984年里根政府競選連任的活動中，里根政府的各部要員，紛紛開口呼籲油價應該下降至合理水平，理由是這樣可以刺激西方的經濟復甦。據溫伯格後來對採訪他的作家施魏策爾表示：「我們供應沙特阿拉伯武器的原因之一，是要它壓低油價。」1985年2月在里根總統剛開始他第二屆任期之際，沙特的法赫德國王 (King Fahd) 赴美作官式訪問。里根總統在接見的時候，一方面親口保證沙

特阿拉伯的國家安全，另一方面表示對油價走向的關注，指出低油價將有利美國經濟的復蘇。

在1985年夏秋之間，出現了兩項新發展，使本來已經奄奄一息的蘇聯經濟，受到休克性的打擊。其一是在美國財政部長貝克 (James A. Baker) 的主導下，西方工業大國的財政部長在紐約開會協議，合作推行「弱美元政策」，一步步把美元在外匯市場上有系統地拋售，在此後十二個月內，美元相對其他貨幣貶值25%。這政策的目的完全是為了糾正美國的貿易逆差，刺激美國貨出口，減少外國貨入口美國。但這對蘇聯經濟卻有意想不到的負面影響，因為國際石油貿易以美元結算，而蘇聯的貿易夥伴以歐洲及日本為主，結果是即使油價不變，蘇聯的賣油收入也因而減少。據美國官方估計，蘇聯為此損失約十五億美元。不過對蘇聯經濟真正的打擊還是來自沙特阿拉伯。在1985年夏季之末，沙特阿拉伯終於為美國各種友好行為打動，同時也為了奪回失去的石油市場，沙特決定實行大量增產，與其他石油輸出國在油價上比拼。據溫伯格回憶：「他們事先向我們發出預警，說他們會大量增產。」

沒有人能夠確切知道為甚麼沙特阿拉伯挑選在這時開始大量增產，不過它的石油部長早已一再向其他石油輸出國組織成員警告他不會坐視自己的石油市場被侵佔，沙特阿拉伯至終會亮出它的「石油武器」反擊。從對蘇聯作經濟戰的角度而言，這是一個絕好的時機，因為此時它的物資匱乏至為明顯，多種工業生產達到瓶頸，無法滿足國內消費者的期望。自1985年起，蘇聯的外匯現金儲存已經捉襟見肘，情報顯示雖然當時金價低迷，但蘇聯仍然加倍它的黃金輸出，以解決

現金不足的困難。中央情報局在當年一份機密報告指出，蘇聯在首季貿易逆差為十四億美元，大為落後於1984年首季的七億美元順差。

在1985年8月數星期內，沙特阿拉伯石油產量從日產不足二百萬桶飛躍至六百萬桶，到了深秋它的產量更提高至九百萬桶。油價在當年11月還可維持在每桶三十美元，但五個月後卻徘徊於十二美元左右。這樣蘇聯一下子便損失了一百億美元的賣油收入，差不多是它對外貿易收入的一半，這簡直是像噩夢一樣。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產量在1986年一度接近一千萬桶，油價最低跌至每桶八美元，但它的石油收入反而較1985年為高。另外由於美國在推出「弱美元政策」前曾向它預早通知，使它在外匯市場上大有收穫——根據美國財政部的秘密報告，這額外收益高達一百億美元。

在1986年5月一份中央情報局的秘密報告以「蘇聯面對外匯短缺困境」作為標題，其內容提要說：

在能源價格不振，石油產量走下坡和美元弱勢的處境下，蘇聯購買西方技術、農產品和工業原材料的能力大減，預料情況不會在80年代結束前有所改善。莫斯科的外匯較往年短絀約三分之一有多，使戈爾巴喬夫的經濟改革計劃，遭遇困難。

此報告引用「油價下降每一美元可引起蘇聯歲收入減少五至十億美元」的事實，結論蘇聯因油價下跌而每年減少一百三十億美元的收入。受弱美元影響的損失，估計為二十億美元。除了石油收入銳減以外，蘇聯的軍火貿易收入也大受打擊。在70年代隨着油價上升，蘇聯的軍火貿易收入增長了五倍，成為能源以外的主要收入來

在1985年夏秋之間，出現了兩項新發展，使本來已經奄奄一息的蘇聯經濟，受到休克性的打擊。其一美國推行的「弱美元政策」。因為國際石油貿易以美元結算，這使得蘇聯的賣油收入減少。不過對蘇聯經濟真正的打擊來自沙特阿拉伯。沙特石油大量增產，1986年一度接近一千萬桶，令油價最低跌至每桶八美元。

在油價大幅下跌後，戈爾巴喬夫面對着蘇聯有史以來最嚴重的財政問題。他希望與美國談判裁軍，藉此減輕蘇聯的軍費開銷。在1986年的雷克雅未克高峰會議上，戈爾巴喬夫提出美蘇兩國共同逐步撤除一切核武器，並且在戰略性和中程核武器上作出很大讓步，以換取里根放棄星戰計劃，但遭到里根拒絕。圖為蘇聯崩潰前夕，民眾示威表達對戈爾巴喬夫的不滿。

源。但在油價下跌後，蘇聯軍火的大客戶：如伊拉克、伊朗和利比亞等產油國家，也和蘇聯同病相憐，外匯短絀，使86年莫斯科的軍火生意減少20%，等於損失二十億美元的收入。

七 失敗的經濟改革

戈爾巴喬夫剛登上領導人寶座後不久，便在1985年4月23日的蘇共中央會議中通過了他的經濟改革方案。其實安德羅波夫在去世前便已經委派戈爾巴喬夫領導研究有關的草議，改革方案便是在其基礎上制訂的。據里根政府駐蘇聯大使馬特洛克 (Jack F. Matlock) 的回憶錄^②記載，當時負責制訂方案的助理把政治改革也一起列進改革內容，但最後被戈爾巴喬夫否決刪去，他加上的批語說：這一部分待將來再提出。改革方案主要內容是整頓蘇共黨內和軍中的管理層，提倡紀律、反貪污腐化和反酗酒等。

一般蘇聯老百姓對新政策最直接的感受是工作壓力增加和酒的供應大

減。當時蘇聯的民生必需品供應奇缺，上班族往往利用午膳時間排隊購物，一排便是兩三個小時，上級一向對此視若無睹，以鬆散管理方式應付。新政策出爐後管理層不得不收緊，甚至派人到商場內巡視，看是否有人在上班時間排隊購物，弄得怨聲載道。1986年初以後油價下滑，外匯短絀，使蘇聯民生必需品缺乏情況更為嚴峻，經濟改革由是更不得人心。

在油價大幅下跌後，戈爾巴喬夫面對的難題已經不單純是經濟制度問題，而還有蘇聯有史以來最嚴重的財政問題。由低油價誘發的財政風暴，使戈爾巴喬夫大失預算：不但不能依靠外貿收入來解決民生必需品的供應，而且資金短缺使新工廠延期落成，大型工業計劃被迫取消，煤礦、油田和天然氣井所急需的新技術裝備停止從西方進口。能源產業技術不能更新，轉而令莫斯科不能以增產手段來增加外匯收入，於是蘇聯經濟進入向下滑坡的惡性循環。經濟改革遂難逃失敗命運。

此時里根政府仍不放鬆，加緊游說各西方國家財團，指出蘇聯財政面臨的嚴峻局面，凱西以退休金融家身份出席銀行業高層內部會議，披露中央情報局的資料，以說服各財團對蘇聯及東歐國家收緊信貸。這樣使蘇聯連以借債度日亦不可能。在經濟和財政上進退維谷之際，戈爾巴喬夫希望在外交上與里根政府談判裁軍，藉此減輕蘇聯在軍費開銷上的重擔。在1985年的日內瓦會議和1986年10月的雷克雅未克 (Reykjavík) 高峰會議上，戈爾巴喬夫與里根兩人開始面對面談判。在雷克雅未克會議中，戈爾巴喬夫更提出共同逐步撤除兩個超級強國的一切核武器，並且在戰略性和中程



核武器上作出很大讓步，以換取里根放棄星戰計劃。假如談判成功的話，蘇聯便不必投入大量資金和美國作軍備競爭，使莫斯科的財政可以稍為紓緩。然而里根拒絕停止星戰計劃，戈爾巴喬夫結果空手而回。

八 從政治改革到帝國解體

在雷克雅未克的外交談判中，戈爾巴喬夫亦企圖說服西方國家放鬆對蘇聯的技術及信貸制裁，但美國堅持莫斯科必需改善人權，逐步自由化，才能考慮放寬制裁。戈爾巴喬夫為了生存，遂不得不在政治上轉向開放政策。最明顯的跡象是在雷克雅未克會議後的12月19日，戈爾巴喬夫親自電話慰問並容許流放在外地的著名異見人士薩哈羅夫 (Andrei Sakharov) 返回莫斯科，翌年1月15日美國便宣布解除對蘇聯的石油天然氣技術及設備禁運，這兩事件的先後發生是否純粹出於巧合，抑或存在因果關係，自然是很耐人尋味的。但以兩個事件出現的時機看來，它極可能是雷克雅未克會議後美蘇雙方達成共識的結果。很明顯，里根政府以胡蘿蔔加棒子的手法促使戈爾巴喬夫走向政治開放之路。

雖然戈爾巴喬夫早在1986年7月31日便已經在演說中提出政治改革，但是實際上要等到1987年1月27日的蘇共中央會議，他才初次提出實行不記名投票選舉，這才真正開動了蘇共黨內的政治改革步伐。然而，牽一髮而動全身，政治改革的呼聲與前景立刻就撼動了蘇聯的政治體制，各加盟共和國乃至東歐各國爭取獨立的浪潮遂高漲不可遏制，這無疑是戈爾巴喬夫乃至里根和凱西都絕對始料不及的。在莫斯科自顧不暇之際，波蘭政

府為了爭取西方貸款以渡過經濟危機，於1989年舉行全國大選，結果團結工會大勝。接着在11月柏林圍牆也在歡呼聲中被群眾拆毀。這是蘇聯勢力撤出東歐的開始，也是蘇聯帝國解體的先兆。在此之前三年，即1986年9月，中央情報局開始向阿富汗的反蘇武裝部隊提供刺針導彈，這種先進的地對空導彈使蘇聯的空中優勢頓時消失，戰爭形勢馬上逆轉。蘇聯損失大增，除了數千名年青軍人戰死沙場外，每年戰爭費用增至四十億美元以上，莫斯科因而不得不痛下決心甩掉這個沉重包袱。1989年初最後一名蘇聯軍人撤離阿富汗，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的首次軍事失利。經過了這連串重大轉折之後，蘇聯在民眾和盟國之間的威信已經蕩然無存，此後它的情況便急轉直下，猶如雪崩般以無可控制之勢趨向解體，那已經是眾所周知的歷史，毋容贅述了。

極其弔詭的是，從1986年底開始里根政府本身也漸漸被一場國內政治風暴所癱瘓。一宗名為「伊朗—尼加拉瓜游擊隊」的事件 (Iran-Contra affair) 成為報章上的頭條新聞，美國國會成立特別委員會調查里根政府是否在秘密外交的行為中觸犯美國法律，里根政府的國家安全議會首當其衝受到調查，它的正常作業大受影響。中央情報局長凱西在當年12月接受割除腦腫瘤手術，1987年1月29日終告不治去世。他不合時宜的死，更添加了這位中央情報局長的神秘性；不久之後，國防部長溫伯格也在里根1989年任滿之前請辭。雖然為里根制訂對蘇經濟戰略的幕僚幹將風流雲散，然而整個戰略已經獲得了本身的生命力，其效果逐步發揮，令蘇聯帝國解體成為不可挽回的事實。這正如結構有缺陷的大廈，在其主要支柱受

里根政府以胡蘿蔔加棒子的手法促使蘇聯走向政治開放之路。在1987年1月27日的蘇共中央會議，戈爾巴喬夫初次提出實行不記名投票選舉，開動了蘇共黨內的政治改革步伐。政治改革的呼聲立刻撼動了蘇聯的政治體制，各加盟共和國乃至東歐各國爭取獨立的浪潮遂高漲不可遏制，這是戈爾巴喬夫乃至里根和凱西都始料不及的。

到衝擊後，它便將無法支持自身重量而搖晃破裂，一發不可收拾的倒塌。

九 結 語

孫子兵法有云：「攻城為下，攻心為上」，以「不戰而屈人之兵」為最高境界。托多羅夫 (Tzvetan Todorov) 在分析西班牙人之所以能夠征服墨西哥的龐大帝國時指出，雖然組織、武器，乃至其所不經意傳播的天花疾病都有重要關係，但衡諸雙方無可比擬的人數差別，真正的決定性因素恐怕還是世界觀，也就是阿茲特克人在其觀念中無從解釋西班牙人出現這一現象，而以之為天意，遂以逆來順受的宿命態度承受其凌辱擄掠^⑩。倘若本文所論證的，美國以石油及其他戰略手段先擊潰蘇聯帝國的經濟，從而改變其政治，至終導致其全面瓦解，這一觀點可以成立的話，那麼孫子和托多羅夫的洞見又在全球抗爭的尺度上得到非常有力的印證了：戰爭不但不限於疆場，也不必限於思想和意識形態，經濟貿易同樣可以成為無形但同樣致命的戰爭手段。那麼，果真如此的話，推而廣之，文化、民俗、大眾傳媒恐怕也不例外，也可以作為戰爭手段吧？以「教化」來攻人之心，屈人之兵，改變人的世界觀，那應該是戰爭的最高境界了。

註釋

⑩ 拉特蘭 (Peter Rutland) 著，劉鋒譯：〈解體與恢復——從戈爾巴喬夫到普京〉，《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4年10月號，頁4。

② Peter Schweizer, *Victory: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s Secret Strategy that Hastene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The Atlantic Monthly Press, 1994). 2001年新華出版社出版殷雄所譯的中譯本，名為《里根政府是怎樣搞垮蘇聯的》。

③ Stephen Kotkin, *Armageddon Averted: The Soviet collapse, 1970-20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④ William Casey, *The Secret War Against Hitler* (New York: Regnery Gateway, 1988).

⑤ Thane Gustafson, *Crisis amid Plenty: The Politics of Soviet Energy under Brezhnev and Gorbachev*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⑥ Susanne Sternthal, *Gorbachev's Reforms: De-Stalinization through Demilitarization* (Westport, Conn.: Praeger, 1997), 29.

⑦ Zdzislaw M. Rurarz, "Poland gives credit where it's due: to Russia", *Wall Street Journal*, 19 June 1985.

⑧ Jack F. Matlock, Jr., *Autopsy on an Empire: The American Ambassador's Account of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5), 57.

⑨ Tzvetan Todorov, *The Conquest of America: The Question of the Other*, trans. Richard Howard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84).

曾鏡濤 1970年中文大學物理系畢業後，赴美專攻太空及等離子物理學，1974年獲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從事聚變能源及應用物理研究三十年，現專業寫作，以能源及中東問題為重心，近著有《石油、伊斯蘭與戰爭——波斯灣風雲內幕》(以筆名曾靖韜由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出版)。